

新历史丛书

甲午战败后的中国，从维新、变法、新政、宪政、革命、共和，直至1915年重回帝制，实验了人类历史上几个阶段的体制。中国人始终不解的一个疑团是：为什么一个泱泱大国不敌蕞尔小国？

用温情与敬意回望三千年未有之巨变 见证中国百年诡譎大动荡

马勇◎著

百年变局

乱世晚清与民国乱象

经济大转型、军事大决战、政治大革命

传统与现代不断融合碰撞，中国经受着大变革所带来的惨痛……



中国工人出版社

新历史丛书



百年变局

乱世晚清与民国乱象

马勇◎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变局 : 乱世晚清与民国乱象 / 马勇著. —北京 :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008-6266-6

I. ①百… II. ①马… III. ①中国历史 - 研究 - 清后期②中国历史 - 研究 - 民国
IV. ①K252.07 ②K2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36108号

百年变局 : 乱世晚清与民国乱象

- 出 版 人 芮宗金
责任编辑 杨博惠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307千字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8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本书虽小，却表达了一个重大主题，即怎样看待过往百年。书的副标题为“乱世晚清与民国乱象”，我不会反对这样的题目，但并不太愿意将过往百年视为一个简单的“乱”。近代历史脉络非常清晰，就是中国能否从传统中走出，一个纯粹的农业文明，能否接纳、兼容一个工业文明。

百年后回望，已看得很清楚了。中国在经过短暂犹豫徘徊后，义无反顾踏上了工业化道路。1860年开始了中国现代化运动，此后不管遇到怎样挫折，中国人现代化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中国人的困惑，不在中国是否应该工业化、现代化，而在中国为什么必须随着工业化而改变自己的政治架构。

确实，从人类已有现代化道路看，不改变政治架构的现代化并不罕见。甚至可以说，不从根本上改变政治架构，更是现代化的保障。英国如此，日本亦然，既有政治架构并不必然是现代化的障碍。

实事求是说，中国原本就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然而为什么英、日能够成功转型，而中国却百年蹉跎呢？道理很浅显，英、日诸国坚持了原有政治架构大框架，但近乎彻底为既有政治框架赋予新内容，既有政治架构不仅没有成为发展障碍，而且成为现代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今天很难想象没有皇室的英、日会是什么样子。

中国也有这样的机会。1906年开始的宪政改革，就是在模仿英、日重建近代民族国家。改革的目标，就是让国家的“产权”“经营权”分离。大清帝国的皇帝拥有至上权威，是国家的象征，不可剥夺，不可亵渎。但至上的皇帝并不再参与

国家日常事务的经营、管理，而是通过一定形式的选举、选拔，将国家日常事务，交给一个“职业经理人”团队去打理。皇上不再处于权力要冲，不再负责具体事务，只是国家象征，至高无上，永不犯错。而职业经理人团队实行“目标管理”，达标了，或许可以再干一个任期；不达标，任期届满，或者届中就可以通过一定程序下课换人。

1906年的改革在有条不紊进行着，可惜的是，两年后，政治强人慈禧太后、光绪帝在不到二十四小时里相继过世。接班团队尽管继承了此前的政治改革路线，但对政治运行的掌控能力实在不足，因而使宪政改革严重受挫。1912年，清帝国终结，表明中国在既有政治架构中调整已完全不可能了，尽管此后几度帝制重建，无不以失败而结束。

帝制，对于中国来说，久已成为往事。中国的未来只能在民主道路上前行。就大势看，不论中国政治改革如何艰难，但大势仍如孙中山先生一百多年前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当然，逆之者，在现在国际背景下并不必然亡，因为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准提升具有“不可逆性”，总是促使各国政治家迎合选民，不敢举起“王道主义”大旗，率有道伐无道，现实主义、孤立主义，将在很长时间困扰人类，从而使后发国家的国际环境较二十世纪更坏。

但人类历史毕竟有大势可循，就像三千年前必须从诸国纷争走上统一一样，自明代中期以来传入中国的西方因素持续发酵，随着中国工业化程度继续提升，中国人对世界中心的向往，对现代性的追求，一定也是不可逆的。百年来的中国，用唐德刚先生的话说，就是在“历史三峡”中穿行，中国终将渡过一连串险滩，汇入人类一致的长河。

这本小书中的文章长短不一，其主旨只在表达这样一点意思。敬请各位不吝赐教。

马 勇

2015年9月

001 洋务自救

Chapter 1

如何看待鸦片战争后的中外条约 / 002

救国、爱国抑或误国 / 004

清末与东亚危机 / 007

东北亚危机缘起 / 015

修约外交开始 / 019

近代中国外交孤立主义由来 / 022

错综复杂“多国杀” / 026

恭亲王挽救帝国危机 / 029

战后中国的道路选择 / 032

《北京条约》签订始末 / 035

南北洋大臣与晚清外交 / 038

严复的欣慰与遗憾 / 041

近代中国何以不能 / 044

甲午战争的经验与教训 / 047

李鸿章忍辱负重马关讲和 / 051

慈禧太后归政记 / 055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博弈 / 064

我们如何看待慈禧太后 / 069

洋务运动：跛足发展留下失败遗憾 / 077

绅商阶层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 082

085 清末新政

Chapter 2

晚清政治改革：逻辑与困境 / 086

“恭亲王”的困惑 / 091

1897年，梁启超在长沙的蜜月时光 / 093

1898年，康有为的逃亡之路 / 097

康有为“衣带诏”真相 / 100

在媚外与排外间徘徊 / 110

由内政而外交：重评义和团战争的一个视角 / 113

以改良反制革命：清廷是怎样走上政治变革道路的 / 144

满洲贵族的变革之痛 / 148

毁誉摄政王 / 157

清末新政为何启动司法改革 / 162

清末联邦制何以不可能 / 166

晚清新政为何走向反面 / 170

177 走向共和

Chapter 3

走向共和是唯一选择 / 178

兵谏的政治诉求 / 180

- 状元张謇：从立宪向共和的转变 / 184
- 清廷不觉醒让革命燎原 / 188
- 武昌起义的远因和近因 / 191
- 紫禁城进入了黄昏 / 196
- 革命与改良：清廷为何终丢江山 / 200
- 孙中山革命思想起源：一个政治史的解读 / 205
- 大变革时代的官范、官德与官箴 / 214
- 辛亥大牌局中的段祺瑞 / 218

233 民初乱局

Chapter 4

- 孙中山的憋屈与别扭 / 234
- 武昌事变后袁世凯到底在想什么 / 241
- 穿越时空求教袁世凯 / 244
- 我们其实并不了解民国 / 248
- 停滞的中华帝国 / 255
- 民主初潮的弄潮儿——宋教仁 / 257
- 重构“民国前半程”历史记忆 / 261
- 清末社会的官民冲突 / 263
- 民初乱源 / 266
- 南京临时政府起源、成立、结束及对民国政治的影响 / 273
- 重看巴黎和约上签字 / 279

洋务自救

所谓一个新的时代，是指此时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自强运动。这个运动自1860年开始，至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而自动结束，前后长达34年。公平地说，洋务新政充分利用难得的几十年和平环境，最大限度减少外部冲突，恢复经济，发展实业，确实将一个古老的中国带向近代国家，奠定了后世发展的基础。

如何看待鸦片战争后的中外条约

在鸦片战争之后 20 年，中国没有善待五口通商带来的机遇，没有下功夫引导中国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产业转型，将农业文明转轨到工业文明；也没有利用五口通商机会去耐心引导消费，培育市场，培育中国人新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理念。中国在经历了战争短暂的痛苦后，很快重回宁静与安逸，重新享受农业文明的好处。

根据《江宁条约》《虎门条约》，所谓“治外法权”，就是在五口或中国内地外国人一旦犯罪，不使用中国法律进行约束和制裁，而是交给英国法庭，运用英国法律量刑治罪。这个规定后来被中国人和中国历史教科书视为最不能接受的不平等条约，认为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法律体系，是中国司法主权的丧失。

这些愤怒从后世观点看当然可以理解，但实在说来，这种愤怒只是后来者的愤怒，并不代表当时人的心情。

相反，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中国人虽然见过不少外国人，不论在宫廷，还是在沿海、沿江，甚至在偏远乡村，外国人，且是真正的西洋人并不少见，西洋人与中国人也并不总是处在冲突状态。但是，怎样管理这些在中国的西洋人，中国政府似乎并没有想好，他们不是愿意让渡自己的司法权，而是不知道怎样运用这项权力。他们能想到的简单办法就是古代中国的“以夷制夷”，让洋人自己管理自己，总比让中国人去管理更省心。

至于那个一直被后世中国人视为不平等的“协议关税”，其实与“治外法权”同等性质，同一个原因，都是因为想省心，所以就主动放弃了这些权力。

参与《江宁条约》《虎门条约》谈判的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并非等闲之辈，他们不仅有着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丰富经历，而且深知中国体制之弊与体制之优。他们还深知鸦片战争之前广东地方政府与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发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他们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从根本上解决的办法。他们真诚

希望英国人同意用一个具有包干性质的固定税率去反制地方政府、强势官员的胡作非为。

他们想到了协议关税，因为这种方式最方便、最省心，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无误地写在条约里，中外双方因此减少了冲突和争执，地方政府和官吏，不论怎样强势，也没有办法额外加税。这既是一个关税包干、财政包干的笨办法，在这些制度设计者看来，一举数得，清廷的财政收入不会因此减少，新税则的“值百抽五”在事实上比先前的税率略有提高；又因为有了这个数额、比例的制度约束，地方政府、强势官员无计可施，不能税上加税。

我们今天看来是一种屈辱或吃亏，但在当年，不论谈判者，还是朝廷，都认为这是中国外交的胜利。他们不愿彻底打开国门，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但他们也不愿意英国人在与中国人做生意时占尽便宜。当然，按照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理论，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所取得的外交成绩是虚假的，是不足信的，牺牲了国家主权，贻害不少。他们争来了不当争不必争的东西，恰恰又放弃、牺牲了不应该放弃的权利和利益。如果历史主义地看待 1840 年代的中国外交，那时的中国毕竟刚刚开始被动地与近代国家打交道，而且是被打败之后不得已而打交道。经验、智慧、眼光，当然没有办法与一个成熟的国家去比较，甚至没有办法与几十年之后的中国相比。直至 1882 年，当中国帮助朝鲜与美国进行修好通商条约谈判时，方才有机会仔细检讨 40 年前有关“协议关税”“治外法权”的利弊得失。

1882 年 2 月 14 日，主持中国外交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在与朝鲜“朝美通商修好条约”谈判代表金允植交换意见时，劝说朝鲜在与美国谈判时一定要注意通商条约的公平合理原则，既不能像《朝日江华条约》那样不定税则，丧失利益，且为各国所窃笑；也不能像中国几十年前那样用一个固定税则一劳永逸。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议立公平章程，如有未尽，就参照他国式样，约定修约时间。5 年一改，或 10 年一改，总不至于将关税主权永久丧失。这就是关税自主原则。中国在经历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方才弄明白，后人当然不应该因此去指责伊里布等人的失误或不察。这是时代的原因。

《江宁条约》《虎门条约》签订后，中国赢得了一个和平时期，只是中国没有利用这个时间去发展自己，依然在浑浑噩噩中度过。而且，还有一个不太好的趋向是，由于中英战争是以条约谈判的方式结束的，因而战争结束不久，美国、法

国等相继要求与清政府签订类似条约。由于此时朝廷并不认为“关税协定”“治外法权”有损于中国主权和商业利益，反而认为是“天朝上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羁縻政策”的胜利，因而尽管也有人反对这样不战就将优惠的商业利益转让给美、法，但清政府主流派依然我行我素，自鸣得意。

他们的理由非常简单，中英订约通商了，战争远去了，“值百抽五”的税率让中国不费劲就坐地收获，中国有什么理由拒绝美、法呢，为什么一定要诉诸战争然后才同意议和呢？更何况，我们不将给英国人的贸易优惠让渡给美国人和法国人，我们有什么把握防止美国人、法国人冒充英国人来与中国人做生意呢？假如美国人、法国人都靠着英国人做生意，他们势必团结一致对付中国，那样的话，中国必将面对一个整齐划一对手，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分而治之，以夷制夷。中国将贸易好处分赏给各国，各国必将感激中国。中国就有机会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维护自己的利益。

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又因为中国那时对国际公法，国际贸易体制、规则并不理解，穆彰阿、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的建议与决策确实问题多多，中国也确实因他们先后签订的那些协议丧失了不少经济利益，丧失了一些主权甚至尊严。但是，应该肯定的是，作为近代中国最早一批与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政治家、外交家，他们的贡献和失误，其实都是那个大变动时代的一笔精神财富，值得珍视，不必总是以后见之明去指责他们媚外、卖国，更不能简单将那些早期条约一律视为不平等。假如真有不平等的话，那也是因为时代，因为无知，因为我们中国那时还远远没有现代意识，远远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救国、爱国抑或误国

被我们称为“鸦片战争”的那场战争，在对手英国人那里称为“通商战争”。这个细节虽说无关宏旨，但确实值得我们警醒。至少这个细节告诉我们，这场战争是因为鸦片，是因为通商。拒绝鸦片继续流入是中国的战争理由；维护自由通

商原则，则是英国人发动这场战争的理由。

英国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是凭借商业资本发展起来的，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竭尽全力地维护自由贸易。用几十年后中国人的认识来看，就是“商战”，就是维护商业资本不受无端侵害。

当时的中国当然不明白这些道理。林则徐替皇上焦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鸦片贸易导致的国力下降、财税减少、兵源恶化，所以林则徐要解决鸦片泛滥问题，他不是从自由贸易原则思考问题，而是基于政治考量，是要从政治上解决问题。

从政治上解决问题，当然不会顾忌自由贸易原则，不会考虑经济上的损失与收益。所以林则徐到了广州，毫不客气地要求英国商人将剩余鸦片全部交出来，要求他们用书面方式保证以后不再在中国从事鸦片贸易。

中英之间不再进行鸦片贸易当然是正确的，问题在于中国初级产品不仅在英伦三岛市场需求巨大，而且英国人在做着全球的中国生意，丝绸、瓷器和茶叶，已经成为欧洲中产阶级必需品，如果放弃了或者说禁止了鸦片贸易，用什么东西替代呢？

由于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用什么东西替代鸦片，自然不被林则徐考虑。林则徐所思所想，就是一定要禁止鸦片继续向中国贸易，甚至不惜为此一战。

为鸦片与英国人开战，当然不是林则徐的权限。不过，这一选择也曾是中国政府讨论的一个方向。问题的困难和尴尬在于，林则徐在执行这个强硬路线时，没有从战略上谋划战争的几种可能结果，至少根本没有考虑中国输掉这场战争怎么办。

战争总是存在输、赢和平局三种结果。

假如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打了一个平局，不输不赢，那么中英之间一定还是延续着先前的贸易形态，继续寻找解决契机；假如中国赢了这场战争，那么，英国就必须接受中国的要求，停止对中国进行鸦片贸易，中英之间贸易往来、和平通商应该有机会重回正轨。

然而，中国在这场战争开打之初就不顺利。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印度舰队司令懿律上将率远征军开往中国沿海。顺便说一句，懿律为英国驻华贸易代表义律的堂兄。

英国远征军的战略方针是绕开林则徐严密布防的广东沿海，抢占浙江舟山群岛，然后派遣远征军一部北上天津，向中国政府转交英国政府的照会，要求中国

政府接受英国的条件，签订英中条约，维护中英贸易往来，维护英国资本在华利益。英国政府的底牌是，一旦这些条件被清政府拒绝，那么懿律有权指挥远征军封锁中国沿海主要港口，不惜一战。

应该说，到了这个时候，中英两国都还有和平解决冲突的机会。然而双方都无视这些机会，都认为自己能赢。

1840年7月4日，英国远征军轻松如愿地攻陷了舟山群岛，然后挥师北上。8月9日，由8艘军舰组成的英国舰队未获任何抵抗就抵达天津附近白河口。16日，英国远征军向清政府递交了外交照会，限清政府在10日内予以答复。

清政府在收到英国照会后陷入一片混乱，尤其是英军远征军抵达京师门户的企图更使清廷高层陷入恐慌。清廷不是准备动手驱逐英国远征军，而是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让英国远征军撤出天津一带，以免危及京师。

8月30日，直隶总督琦善代表清政府与英国远征军举行谈判，除赔偿在广东销毁的鸦片货价及将中国岛屿永久割让给英国这两条还须讨论外，琦善代表清政府原则上同意了英国政府照会中的各项要求。

为了尽早解除想象中的京师危机，清政府在与英军进行谈判时，大体上感觉到英军之所以如此猖狂，似乎主要来源于林则徐的鲁莽，因此清廷谈判代表直观感觉，只有适度惩罚林则徐才能有效平息英国人的愤恨，也才能真正解除京师危机。就连道光帝本人，此时也已不像先前那样信任林则徐，皇上以为现在京师危机以及南方局势日趋恶化，在很大程度上均来源于林则徐的误导，因为林则徐在战争开始前确曾乐观地向朝廷报告，英国与中国远隔万里，不会也不可能与中国轻易开战。而现在英国不仅把战争强加给中国，且蛮横地进逼京师，直指帝国心脏。于是为了讨好英军，也为了解除京师危机，清廷遂于9月4日同意英国人要求，下诏解除林则徐钦差大臣等职务。

同一天，清廷宣布中英之间的贸易往来全部恢复，这又在事实上彻底否定了林则徐在广州的禁烟措施。

林则徐的目标当然是救国，其精神当然是爱国，但在朝廷眼中，林则徐的这些措施不仅没有救国，不是爱国，反而带来了麻烦，导致了一场原本可以不发生的战争。因而在清廷眼里，林则徐的所作所为就是误国、误君，是罪无可道。这是1840年那场鸦片战争或叫作“通商战争”最吊诡、最令人困惑的地方。

清末与东亚危机

自从汉代武帝独尊儒家之后，中国意识形态就很羞于言说“霸道政治”，一味高扬儒家“王道政治”理想，以德服人，不以武力征服为政治首选。当然，汉武帝之后实际的政治运作并非完全如此，真相或许就像武帝曾孙汉宣帝所说的那样：“汉家自有制度始，本以霸王道杂之。”从汉代至清末，历代统治者无论如何热衷于事功，大致还是遵循以孝治天下的原则率先垂范，所以早期西方人看中国就是一个彬彬有礼的理想国。

贸易逆差的隐患

在16世纪中西接触之初，西方人无不用充满敬佩之情看中国，有效的社会管制、井然有序的社会、高素质的统治阶层，在西方人看来就是古希腊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哲学家治国。那时的中国面对西方也很谦逊，继续信奉先贤教诲，“儒者以一事不知以为耻”，以文明古国的心态坦然面对域外文明。比如几何是传统中国数学中的短板，但当徐光启遇到利玛窦，知道西方人在这方面的贡献后，毫无羞怯地与利玛窦合作，将古希腊大数学家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译成中文，丰富了中国文明表达方式。那时的中国，尽管在政治上已处于下降渠道，但在文化心态上还能坦然容纳异质文明，知道什么好什么不好。

然而遗憾的是，对谁都有好处的中西文明交流因明清易代而中断。新王朝的统治者来自周边族群，他们当时面临汉化和西化的双重压力，出于功利考量，满洲贵族在定鼎中原后终止了晚明以来向西方学习的趋势，专心致志地汉化。

西方势力东来原本就是工业革命产能过剩的产物，再加上机缘巧合遇到了大航路的开辟，使西方与东方之间的联系变得非常方便。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有拒绝和接受两种选择。主动接受就像日本一样，将西方文明引进来，这也是古典中国面对域外文明时常常做出的选择。然而清廷选择了拒绝。

这个选择在客观效果上使中西文明的交流由官方主导，更多地流向了非官方层面。但是，在经过一段漫长的发展之后，自然衍生出许多问题。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巨大的贸易逆差。由于中国市场不发育，西方工业革命的产品在中国没有市场，而西方社会对于中国价廉物美的茶叶、瓷器、丝绸等低级产品需求巨大。巨大的贸易逆差表面上对中国好处多多，其实政治上的风险一触即发。

到了乾隆年间，巨大的贸易逆差使西方似乎无法支撑了。1793年，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伯爵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前往中国进行谈判，希望中国：一、适度放宽中英之间贸易限制；二、对在舟山附近岛屿上的英商货舱及停泊在那里的船只不设防；三、希望在北京设立永久使领馆，与中国构建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关系。

从今天“招商引资扩大贸易”的观点看，马戛尔尼三点要求没有什么不可接受，但满洲统治者根本无意改变既有秩序，依然陶醉在天朝上国的梦幻中。马戛尔尼访华以失败而告终，由此注定近代中国的全部悲剧。

“天朝上国”思维的后果

中西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还在继续扩大。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政府早已成为商业的保护神，不得已，英国政府又在二十多年后即1816年派遣阿美士德使团访华，继续商谈扩大通商平衡贸易的可能性，请求清廷废除贸易管制的公行制度，多开商埠，扩大自由贸易。此时大清皇帝为嘉庆帝，他的做法比乃父更绝。他在获悉阿美士德使团目的后，还没有见到来使，就下令将他们驱逐出北京，勒令返国。

我们过去用很多文化上的理由去替乾隆帝和嘉庆帝辩护，以为马戛尔尼、阿美士德入境不愿随俗，不愿向中国皇帝下跪，大有蔑视中国尊严的味道。

其实，这些辩解是不得要领的。乾隆帝、嘉庆帝相继拒绝和平通商，主要还是西方工业革命的结果中国不需要，尽管宫廷中关于西方的奇技淫巧应有尽有，但中国市场未发育，民众不需要，清廷也就乐于维持着中西贸易的巨额顺差，乐于看到西方的白银随着中国初级产品瓷器、茶叶、丝绸的西行而源源不断流入中国。经济的原因是根本原因，文明冲突，其实只是后世学者不明就里的一个蹩脚理由。

清廷不愿在扩大贸易和构建平等国家关系上让步，是“天朝上国”思维。但

当世界联系日趋紧密时，这种做法是无效的。面对巨额逆差，英国“不法商人”将鸦片作为平衡贸易的手段，短短 20 年时间，“罪恶的鸦片贸易”就使英国彻底改变了对华人朝地位。

鸦片贸易在中国已有久远历史，先前只是作为药材、贡品流入中国。然而 19 世纪中叶大规模的鸦片贸易，不仅彻底改变了中西贸易格局，使大量真金白银流往西方，而且给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带来严重问题。到了 19 世纪 30 年代晚期，鸦片已使中国几无可用品，更无可用品之饷。傲慢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终于承认到了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

罪恶的鸦片贸易害苦了中国，但面对这个事实究竟应该怎样处理呢？林则徐建议朝廷用强硬手段打击鸦片走私。他确实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只是鸦片虽然现在被说成是“非法贸易”，但在之前几十年时间毕竟是一个默许的事实存在。于是如林则徐虎门销烟等断然措施引起英国人强烈反对，一场以鸦片为名的战争随之爆发。

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而结束，城下之盟使中国屈辱地接受了英国人自马戛尔尼以来所提出的要求，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外加一笔数额不菲的战争赔款。五口通商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构成和经济格局，中西之间的贸易往来因为这个有限度的开放在改善。

然而由于这个开放有限度，中外贸易依然存在不少问题。1854 年，英国因中美新约向清廷提出重新修约，希望中国开放全境，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稍后，法、美两国援例提出类似要求。

列强的这些要求是对的。比如，互派公使照料贸易、开放全境扩大市场等，都是进步的。然而清廷又选择了拒绝，于是英法联军又用武力向中国讹诈。这就是近代史上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战争的结果还是中国失败，清廷屈辱答应了列强全部要求，同意公使常驻北京，同意增开牛庄、登州、台湾、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同意传教士到内地自由传教、外国人随意旅游经商，同意外国商船在长江口岸自由往来，同意修改税则。当然，还有因战争而发生的军费赔偿。

被误读的“落后就要挨打”

两次鸦片战争均以中国失败而结束，中国不仅因此丢尽了脸面，而且损失惨